

「把自己嫁给中国」的新西兰友人

凯瑟琳·霍尔



被中国共产党感动的外国人

凯瑟琳·霍尔（Kathleen Hall）是一位新西兰女护士，上世纪20至40年代在中国工作十几年，帮助白求恩和八路军购买运输了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材，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穷人看病的“何先生”

1896年，凯瑟琳·霍尔出生于新西兰北岛的纳皮尔市，父亲是公务员，母亲当过教师，她在家中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五，先后在家政学校、医院接受教育培训，成为一名专业的护士。1922年，她接受新西兰圣公会派遣，来中国从事医护和传教工作。学习了一年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后，到北京协和医院从事护理和教学工作，其间她跟随布道团深入山西、河北的贫困山区，为当地百姓治病。在目睹了中国的贫穷落后，霍尔对穷人的疾苦非常同情，决心要尽自己全力帮助他们，于是放弃在条件较好的北京协和医院的工作，先后到落后的山西大同、冀中河间教会医院工作。

1927年，霍尔来到冀中安国圣公会医院担任护士长。在医院男院新建完工后，她拿出自己的积蓄来增建女院，以改善当地妇女的就医条件。霍尔主持了两期护士培训班，亲自授课，共培养出60多名医护人员。1933年，她到曲阳、唐县的乡村做巡回医疗，5个月中出诊400次，为3000多位村民看病。她看到农村医疗卫生设施落后、农民生活条件差，进一步坚定了为穷人服务、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理念。20世纪30年代，黑热病、天花、疟疾、霍乱等传染病在安国肆虐，严重威胁当地百姓的健康和生命。霍尔带着医疗救护队，冒着被传染的风险，千方百计防治这些疾病，被当地人称作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为了能长期帮助穷人，1935年，霍尔在曲阳县宋家庄、唐县牛眼沟建起两座诊所。为了方便与中国人沟通交流，她给自己起了个好听的中文名字“何明清”，当地人都尊称她为“何先生”。她经常住在山里，讲着当地方言，出诊时一个人背着药匣不分昼夜地走，有时要爬几十里山路，却不叫苦叫累。霍尔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人，不论穷富。她对看病的人说：“给穷人看病不要钱，帮助穷人不是为了钱。”村民们都说“何大夫不怕脏不怕累，是个好人”“何先生在这里做的好事数不清”。除了治病救人，霍尔还倡导文



明生活，帮助村民学习公共卫生知识、树立个人健康常识，开展启蒙教育，让村民们识字、学习一技之长。她和蔼可亲的态度、高超精湛的医术和无私助人的精神得到了村民们的敬佩和赞赏。

帮八路军运送药品的“战地天使”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霍尔目睹了日本人烧杀抢掠，对侵略者无比痛恨、对中国人民更加同情，当她看到八路军为保护人民浴血奋战后，从心里由衷钦佩这支军队。宋家庄诊所与晋察冀军区总部相距几十公里，1938至1939年，霍尔经常到聂荣臻司令驻地汇报情况。聂荣臻对她讲：“你信上帝，我们共产党也信上帝。不过你们信的是耶稣，我们信的是劳苦大众，我们就是为他们工作。”这让霍尔深受感动，她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人广阔的胸怀像大海，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改变面貌。因为他们有严明的纪律，他们能给人们带来积极、热情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霍尔开始从一个善良的、讲人道的传教士向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国际主义战士转变。

由于日军的严密管制与封锁，八路军的药品非常短缺，医疗物资也供应困难。1938年12月，白求恩从唐县到曲阳拜访霍尔，向她介绍了八路军面临缺医少药的情况，霍尔马上让助手把自己诊所的手术器械和外用药品收集到一起，让白求恩带走。在深入交谈后，白求恩确定霍尔是可信赖的人，请求她帮助八路军购买药品物资并运送回来，霍尔答应了这一充满危险的请求。白求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遇见了一个天使，她将上北平买药品器材，并且把它们为我们带回来！”

霍尔利用外国人身份的便利，不畏艰辛、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日军一道道封锁线，去北平购买并运回药品、医疗器械、无线电器材等物资30多次，为边区转移爱国抗日人士和医务人员40多人，极大地缓解了八路军缺医少药、医务人员不足的状况。在她帮助转移到边区的人员中，就有后来成为柯棣华夫人的郭庆兰，几十年后郭庆兰仍心怀感激地说：“我感谢何明清，是这个外国人把我领上了中国的革命道路。”

霍尔帮助八路军的行为，令日军对其恨之入骨。1939年7月，日军发动扫荡，把宋家庄诊所付之一炬，也将她扣押并驱逐出中国。霍尔不得不离开服务了几十年的中国。9月，她到香港时与宋庆龄取得了联系，提出了继续为中国服务的要求，宋庆龄安排她跟随红十字会一支运送药品的医疗队前往八路军总部。经历了半年多的艰难旅程，终于接近目的地，但不幸的是霍尔这时病倒了，不得不停止这次行程，回国休养。

永远的中新友谊桥梁

1941年，霍尔回到新西兰，多次寻找机会准备返回中国，但因各种环境限制一直未能如愿。在新西兰，她致力于中新友好活动，和著名记者贝特兰等在惠灵顿组建了中新友好协会惠灵顿分会，1958年又组建了全国性的中新友好协会，后又任该协会奥克兰分会执委，在新西兰宣传真实的中国、发出友好的声音。

1960年，霍尔受邀来华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活动，受到了周恩来、宋庆龄、聂荣臻等老朋友的接见，并来到了石家庄为白求恩扫墓，重访了安国医院，勉励医护人员学习白求恩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1964年再次来中国访问，重访了大同。1970年4月，霍尔走完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终年74岁。霍尔一生未婚，她曾经说过：“我把自己嫁给了中国。”路易·艾黎称赞霍尔：“她的伟大之处在于伟大的牺牲，来之于兵荒马北的病苦年代。她以爱和温暖和普通中国人民一起工作，这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1990年，聂荣臻元帅为她写下了“救死扶伤，英勇献身，支持抗战，青史永存”的题词。1993年，霍尔的骨灰遵照她生前意愿安葬在宋家庄莲花山上和曲阳县烈士陵园。在宋家庄，当地人把小学以她的中文名字命名为“何明清小学”，重建了“何明清诊所”，在保定市修建了“何明清纪念馆”，中新友协还设立了资助中国贫困家庭学生的“何明清纪念奖学金”。霍尔已经成为中新友谊坚实的桥梁，她的事迹镌刻在中新交往的史册上，她无私无畏的国际主义精神将被中新两国人民永远怀念。

“四库学”的新生

□ 陈晓华 李沛恒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最重要的文化工程，它对先秦至清中叶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全面系统整理，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有关它的研究，至今已由《四库全书》的“四库学”发展到内涵外延都拓展了的本原之学。“四库学”是研究四库及其相关问题的学问。这门学问，包含着一个体系，即四库体系。

什么是四库学

那么，四库体系是什么？四库体系，是中国古代典籍按照经史子集顺序排列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是经史子集四部系统组成的一个新系统。

当然，四库这个体系并不会妨碍“四库学”的深度。因为书籍是知识的储藏库，而四库体系也就基本上容纳了中国古典时期的知识，“四库学”也就是中国知识学。因此，有了这个体系的中国古典文化，秩序性、规范性、系统性、条理性也更突出。

那么，“四库学”和中国文化关系如何？文化，由雅俗两部分组成，中国古典文化亦然。不过，这些雅与俗的中华古典文化，都无以脱离知行。而无论雅俗或知行，它们在中国古代全被纳入四库。也就是说，四库学，是雅俗共赏、知行合一的中国知识学，而它所有的知行建构了它的文化，即四库文化。四库文化再反哺“四库学”，“四库学”因之得以丰实。如此循环往复，源头活水不绝，生命力也就不会枯竭。

鉴于“四库学”是“新生”的事物，为便于理解，我们不妨把它与国学放在一起加以说明。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即价值之学的人文传统和规律之学的科学传统的国学，“四库学”与之相当。科学与人文双轮驱动，在科学与人文、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这三个知识学、人类学、社会学维度交织而成的文化语境中激活并发展着中国文化。这里把人类学、社会学从知识学中别裁出来，是为了强调它们二者不同于其他知识学的特别之处。当然，人类学、社会学再特别，也最终要汇入知识学，成为知识学

中国古代官吏考核考察制度（二）

□ 郝玉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核制度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官吏选拔实行了“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事实上官吏选拔被士族势力所把控，家庭出身成为决定官吏晋升、选用的重要依据。因此，这一时期的考核制度对官吏晋升等结果影响很小，加之连年战乱，致使考课制度难以施行，仅有个别朝代制定了考核制度。其中典型代表有两个：一是三国两晋中的西晋时期晋武帝司马炎制定的“五条课郡县法”，主要内容包括正身、勤百姓、抚孤寡、敦本息末、去人事五个方面，涵盖了政德、勤政、廉政、发展生产等各项要求；二是南北朝时期北朝西魏时期执政大臣宇文泰主持制定的“六条课郡法”，主要包括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六个方面，涵盖了对地方官政治、文化、经济以及选人用人等各项要求。

总体来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受基本的门阀政治影响，其官吏考核制度及对考核进行监督的监察制度都相对不够健全，考核结果很大程度受到门阀势力干预影响，其真实性和有效性大大降低，即便有个别朝代建立了

的一部分。此外，与国学相当的“四库学”，也是国学的体系框架，且是土生土长的。为实现它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它一方面需要做出适应当代语境的新诠释，另一方面则要尽可能与古今中西互动、融合、超越。

雅俗共赏的四库学

作为历史长河中一员的“四库学”，本就雅俗共生、知行合一，有关它的整理研究也就理应雅俗并重、知行合一，但至今鲜有能够把雅俗、知行联系起来的。就高雅方面而言，“四库学”已回归本原，但有关它的整理研究工作还大有空间，理论构建的工作也至今没有完成。具体而言，“四库学”研究对象是什么、它与中国古典学术关系如何、中国古典学术发展脉络怎样、与中国古典文化以及相关学科关系如何，怎么去界定这些问题；它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的作用、对东西方的认知及其发展历程、与西方思维方法和学术体系等的异同；“四库学”发展应如何规划，如何为四库学界在知行方面提供可行践的路径、方式方法，都是须要做出阐释和加以说明的问题。而这些方面迄今几为空白。

至于通俗方面，“四库学”如何与现实接轨，成就本原的知行合一，实现它自己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鲜有问津，与“四库学”需要大力普及传播的地位不匹配。当然，这也是整理研究最终都要接轨现实、服务当下，对“四库学”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时代的需要。新时代需要提升文化自信，建构中国特色话语、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四库学”正可提供鉴借。能提供这个鉴借的“四库学”，也就不可能只是阳春白雪，它需要对接大众，也就需要大力普及传播。并且它与国学相当，有实现全民普及传播的可能。这也就自然是它坚持不懈的工作。当然，其实所有的学问都不应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都应该走出去，走入大众中。比如，挖掘“四库学”

中的文化遗产，整理、保护、传承、利用、开发它们，就是实践知行合一的最好途径。以《四库全书》为例，就是要把《四库全书》所承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涵其中的思想和历史，以正确的方式加以利用，正可以“纠谬、订误、清糟，给后人留下一部绝真标准的文化遗产和可信的文脉”。同时，要大力做好与普及传播相联系的工作，像在图书馆、中小学普及传播四库文化，培养普及传播的四库文化宣讲者，运用网络媒体宣传四库文化等。至于具体行动方面，如就《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就会带动四库知行，相辅相成，走向深入。

当然，“四库学”还需要在学科建设方面着力，在整理好基础文献基础上，建构完善自己的理论，才能更好完成四库文化的普及传播。

四库学是承前启后之学

四库因纲纪中国古代书籍，而成为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的代称。因为学术学科是通过各书书籍来传达自己的特质与理念，而经史子集四部是中国古代书籍分类的主流与核心，所以经史子集四部就是中国古典学术学科的科目类别，基于四部而成的四库也就承载着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之本流失颇多，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即四库，还没有被近代中国人认真审视权衡，就被人中断，彻底抛弃了。这既是西方文化的冲击，也是中国自己在西学冲击下，对古今中外认知不足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在学术学科体系方面，新旧之间的交接工作还没做，就匆忙借鉴西方学术学科体系，这就使当今中国的学术学科体系本土性较弱。虽然如此，但如前所言，四库承载着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因此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不会因被截流而寻不到根源，故而“四库学”关乎中国优秀文化及其传承，并正可重塑并使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焕发出生命力，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文化自信体系、话语体系

等提供借鉴。今天，随着新的“四库学”研究机构、“四库学”方面二级学会的成立与学术集刊的持续出版，《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倡议的提出与实践，“四库学”入图书馆、中小学，新抄《四库全书》等，与“四库学”整理研究一道，共同将“四库学”推向新征程，使它雅俗共赏、知行合一的特质得以激活。这既使重塑工作切实可行，也使它能为新时代提供借鉴，有足够的支撑。

另外，虽然事实上四库承载着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但对中国是否有古典学术学科及其体系，一直有否定之声。而“四库学”，虽然事实上古已有之，但如中国大多数古典学科的概念往往滞后一样，“四库学”概念也是后来有之。因此，如何完成恢复历史本原、释疑分，并能把后起的学科概念与早已实存的学科有机衔接起来，能叙述清楚，逻辑上也没有问题，是摆在学界面前的重任。

可喜的是，今天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势必重拾新时代中国特色风格气派学术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由此，承载着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的四库，以及它的学问“四库学”及其研究的地位与价值不言而喻。

的确，由“四库学”概念的出现到提升，正是一部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兴衰史。虽然“四库学”错过了中国大多数学科概念出现的20世纪上半叶，迟滞到20世纪80年代才成学，数十年后才回归本原，并倡导整理研究与普及传播并重，知行合一，但却深蕴中华文化的独特性，能彰显中华文化的曲折历程，反映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盛衰，还有不少空白等待发现填补，其空间广阔，其意义重大。



官为郎中和员外郎，郎中为从五品，负责京官考核，员外郎为从六品，负责地方官考核。在对官吏进行考核的同时，还加强对官吏考核的监督。唐太宗贞观年间，在尚书省设立专门考校使开展考核工作的同时，在中书省设中立中书舍人、在门下省设立给事中，分别对地方官和京官考核进行监督。三品以上官吏考核由皇帝亲自负责。

在考核周期上，唐朝分为一年一小考和三至五年（通常为四年）一大考，小考评定当年的政绩，大考综合历年小考进行评定，依据大考结果确定官吏升降奖惩。在考核程序上，唐朝设置了初考、复考、当众宣布结果并公示、对结果不服可以申诉等考核环节。在考核内容上，唐朝设定了比较严密细致的“四善二十七最”考核标准，“四善”是对政治品德方面设定的通用性标准，指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四个方面；“二十七最”对划分的二十七个职业（职位）门类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与特点设定个性化的最佳业绩标准，二十七个职业（职位）门类为近侍、选司、考校、礼官、乐官、判事、宿卫、督领、法官、校正、宣纳、学官、将帅、政教、文史、纠正、句检、监掌、役使、屯官、仓库、历官、方术、关津、市司、牧官、镇防。依据“四善二十七最”的考核标准，结合“最”和“善”的表现情况，将考核结果划分为九个等次，分别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以中中为考核合格标准线，考核为中中的俸禄不增不减，考核在中中以上等次的分别给与增加俸禄奖励，考核在中中以下等次的分别给与减少俸禄的惩罚。

唐朝设定的“四善二十七最”的考核标准，以其精细化分类和制度完备性在古代政治历史上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也是比较早的体现职业（职位）区分类别进行考核的做法，既对官吏的政治品德和素质进行考核，也对官吏的执政能力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体现出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与现代科学管理理论和绩效考核技术方法相比，尽管当时对州县地方官在户口、田亩等考核上也有数量考核要求，体现出定量考核的基本思想，但在整体考核标准上仍以定性要求为主，仍然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局限性，不过在封建政治制度时期已经展现出超越以前各个王朝的制度上的发展进步，这还是值得肯定的。